

粵商

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

楊黎光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繁體 版 序

近代中國主要有三大商幫：徽商、晉商、粵商，徽商和晉商因各種局限，基本都止步於現代化。唯有粵商，因明清以來面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一直在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變遷，成為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斷發生碰撞、衝突與融合的交匯點上，在歷史風雲變幻之中，通過港澳南洋，一直根脈不斷地發展至今。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市場經濟並不是很發達的安徽與山西，徽商與晉商，由於廣泛的宣傳，特別是一些成功的影視作品的播出，幾乎家喻戶曉，並成為一個地方商幫的金字招牌。筆者就是安徽人，徽商不僅有史志，甚至形成一個徽文化系列，連今天的安徽地方銀行，都叫徽商銀行。

而根脈一直未斷，經商足跡幾乎遍及五洲四洋並產生過世界首富的粵商，似乎顯得是那麼令人費解的「低調內斂」，甚至連一部系統的發展史都沒有，使人們霧裡看花。於是，筆者有幸為粵商寫一部史。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經過海量的研究和考察後，完成了這部著作。為了使史更好看，我沒有按照史志來寫，而是用思辨的文學方式完成此書。

今天香港中和出版社在港台海外地區出版它的繁體字本，我很高興有更多的港台和海外讀者能讀到此書，因為有很多的粵商後人和發

展得更好的新粵商，正在海外商海拼搏，他們也許更需要了解幾百年來粵商的發展沉浮，而以史為鑒，走向未來。

是為序。

楊黎光

2019年9月8日於深圳

〔自序〕

2009 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來到了中山市孫文西路上的一幢古老的小樓前。中山市前身為 1152 年設立的香山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1925 年 3 月，積勞成疾的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為了紀念這位首舉徹底反封建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帝制」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開拓者，當年 4 月民國政府將香山縣改名為中山縣。1983 年 12 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山縣撤縣改市。我走近的這幢充滿着歲月痕跡的三層小樓，原為香山縣商會舊址，現被改建為一個規



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

模不大，卻很有特色的中國首家商業文化博物館。我來到這裡，是為了解考察孫中山先生有關「實業救國」和一批又一批香山實業家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而做出貢獻的史料，為撰寫我的「追尋近代中國現代化腳印」的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中山路》做研究。

當我端詳着這幢粉白相間、有着南洋風格的小樓時，腦中呈現出數月來在澳門、珠海、中山（這三個城市歷史上都屬於香山縣）的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裡查閱和收集到的那些歷史資料所形成的畫面。我在想，這幢樓裡又會給我帶來些甚麼呢？

我抬腳跨進了大門——赫然間，五位歷史名人迎面站在我的面前。

從左至右，他們分別是著名實業家、當年在中國有「茶王」和「地產大王」之稱的徐潤，著名實業家、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唐廷樞，著名實業家、曾以《盛世危言》一書影響了包括孫中山和毛澤東等在內的一批中國精英的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著名實業家、引領中國現代時尚文化風行之先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創始人馬應彪、郭樂。這是五尊真人大小的人物塑像，三位穿清末民初的長袍馬褂，兩位西裝革履，成弧形面對着博物館的大門，迎接着所有來館參觀的人們。

這五個人的名字以前在看中國近代史時，都有所接觸，但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所以了解並不深。這次到中山、珠海、澳門和香港採訪考察，以這五位為傑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香山或者說粵籍實業家，形成一個浩蕩的梯隊從歷史中走來，一個一個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影響了一個中國，影響了數個朝代。他們雖然在不同的領域，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經歷，也做出了不同的貢獻，但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粵籍，二都是商人，所以他們共性的名字叫：粵商。

我突然覺得，有這五位在近代中國工商業發展史上聲名煊赫的人物在，這家小小的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了。這五個人，已經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譜系，同時也都是中國「實業救國」以及為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

我感覺到，我這一步跨進了從清末到民國，粵商們所走過的那段凝重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又與孫中山先生後來努力想實現的「實業救國



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序廳的五人雕像，從左至右為：徐潤、唐廷樞、鄭觀應、馬應彪、郭樂。

計劃」前後相連。

孫中山先生自小生活在香山縣的翠亨村，父母都是農民，因此他對中國底層勞動大眾的苦難有着實際的了解，並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發展實業，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過「物暢其流」而強國富民，使民眾過上溫飽的日子。民生主義可以說是孫中山思想體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發展實業的主張則是民生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孫中山先生認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新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是為了最終能夠謀求國家的富強，從而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所以，孫中山將革命的目的與中國的富強和振興密切聯繫起來，多次明確提出要通過發展教育和交通，「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

其實，實業救國論在 19 世紀末就已出現，到了辛亥革命前後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理論。20 世紀初，宣揚實業救國論的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如實業家張謇等，他們和孫中山先生「實業救國論」的區別是，張謇是舊陣營的改革者，孫中山是新陣營的革命家，兩人出於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共同關注，都提出了實業救國的思想主張。

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始終面臨着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經過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以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反覆探索、解答，給出了多種不同的發展指向，然而，最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卻是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民國學者王孝通說：「辛亥革命，其端實啟自商人。……民國之造，商人當在首功之列。」

如今談起近代中國的商人，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晉商，在史學界、文學界、出版界充滿着關於反映他們的作品，而曾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軌跡的粵商卻被嚴重忽視了。他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做出的獨特貢獻亦彷彿墜入了歷史的煙塵之中。有關係統介紹粵商發展史的論著，在廣東、在全國、在史學界、在文學界都寥若晨星。

自明清以來，粵商作為繼徽商、晉商之後崛起的另一股強大的商業力量，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相始終，承前後，脈絡始終未斷。

浩瀚的藍色大海使粵商獲得了有別於徽商、晉商成長的經歷與精神氣質。他們始終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得益於海上貿易，也致力於對外開放。他們的成敗興衰，既反映了中國沿海商人面臨世界大局變幻時的調適和應對，也折射出了中國維新變革的艱難與成就。可以說，粵商的演變史，濃縮了傳統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卓越歷程。

粵商之所以獨樹一幟、引人矚目，還在於他們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傳統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尤其在中國社會進入變局，面臨路徑選擇的時候，他們總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以自己的實踐為國家民族開拓出新的未來。

我出生於安徽安慶，歷史上安慶和徽州這兩個城市，是安徽重要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安慶是省會，徽州是徽商的故里。「安徽」兩個字就是各取自於這兩個城市的名字：「安（慶）—徽（州）」。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有着「三進」（相當於北京三個四合院直串起來）的徽商的大宅子裡，這個有着幾百年歷史的徽式大宅子寫進了我的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因此我自小就對徽商充滿了興趣，80年代初就曾到徽州去考察過，收集了很多有關徽商的歷史資料。家族祖上也曾

為徽商，只是到了我爺爺那一輩就已經完全破落，以至於父親變成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城市貧民。記得小時候家裡有一個殘破的高腳桌，比書桌高，比供桌又多了兩個大抽斗，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面正中在兩個大抽斗之上，並排開着兩個窄窄的還用銅皮包着邊的長形的孔。我一直不知道這張桌子是幹甚麼用的。後來，聽外婆說是家裡祖上開店時的錢櫃，桌面上那兩個窄窄的孔，就是做生意時收款塞銅錢和銀元的。後來，我又專門去山西考察過晉商，從太原出發，到過平遙、太谷、祁縣，最後到大同，逛過平遙的老街，進過喬家的大院，先後走了七天。自覺對徽商晉商的歷史了解一些，也想寫點甚麼，但一直沒有想好主題。

後南下深圳二十多年，一直在報業工作，幾十年來雖然已經完全融入了嶺南的生活，但自我的身份認同仍然是一個安徽人，仍然是一個新移民，所寫的著作仍然以一個移民的視野居多。

自 2008 年應邀創作《中山路》一書後，我系統地了解了嶺南的歷史和文明，也系統地了解了近代嶺南人，特別是粵商對中國現代化艱難進程的貢獻，可還沒有看到能系統地幫助人們了解這段波瀾壯闊歷史的書籍。於是就有了一個想法，能不能寫一本有關粵商發展的書，並常常在一些聚會裡、採訪中、講課時，談粵商、談自己對粵商發展的看法。後我又被那龐雜的歷史資料的收集、歸納和分析所難住，我想，我只是一個作家，在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匱乏，會不會犯「班門弄斧」的錯誤？再加上報社工作繁忙，這個想法雖然一直沒有放棄，但也只是留在心裡。

後來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斷鼓勵，特別是顧作義先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在得知我有這個想法後，幾年來不斷地鼓勵催促我，建議我放下手頭的一些工作，集中精力寫好此書。2012 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出差，傍晚時分突然接到顧作義先生的電話，他說當前中國正處在新三十年改革之際，歸納、研究、總結粵商的發展史，表現這個群體實現「中國現代化之夢」的歷程，無論是對現實和歷史都有着重大意義。他鼓勵我應該克服困難，挑起重任，盡快上馬。

於是，我就這樣被「架」上了馬，從 2013 年 1 月 4 日北上天津南開大學參加一個粵商發展的學術研究會開始，整整寫了三年，這是我報

告文學創作中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如今一本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粵商：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呈現在了讀者面前。是非成敗，自有讀者評說。

來廣東二十多年，寫了二十多本書，出了十三卷的文集，自覺已經是融入嶺南的一位作家，終於有一本記載着廣東粵商歷史發展的書，放在歷史的書架上。

我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成就感。

是為序。

楊黎光

2016 年元旦夜於深圳世紀村

I 繁體版序

III 自序

001 前言 海洋、商人與中國社會轉型

考察中國社會轉型，追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腳印，一個長期被人遺忘的事實便是：得風氣之先，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變遷，進而走在變革前列的，是明清以來一直在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這個群體被稱為：粵商。

粵商，才是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斷發生碰撞、衝突與融合的交匯點上，在歷史風雲變幻之際，承載起轉型之重任，腳踏實地推動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017 第一章 嶺南，一片屬於探索者的土地

千百年來，嶺南作為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的融合之地，得山海之利，發展出了特有的以五嶺—珠江—海洋為表徵的山海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無論是穿越「梅關古道」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還是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國商人，他們都是不畏艱辛的探索者，他們及其後代子孫的身上都蘊藏着開拓者的基因。

這也是嶺南人樂於面對藍色海洋，勇於改變陳舊世界的文化血脈。

045 第二章 粵商，萌生於大航海時代

自古以來，中國人一向把海洋作為封閉自守的天然屏障，歐洲人則讓它變成了通向未來的探索之路。當歐洲人開始越過大洋全神貫注地凝望中國的時侯，距離粵商因勢而起的日子，就已經不遠了。

在專制政體裡，商人的活動空間非常有限，商品經濟的發展受到種種約束。但也正是因為營商環境的嚴酷，粵商的出現才顯得可貴。他們在官方嚴密管制的縫隙間尋尋覓覓，艱難成長。

歷史的發展將不斷證明，粵商的萌生和奮起，呼應了遙遠歐洲的商業革命，促進了中國的社會轉型。

065 第三章 從海上到口岸，主流粵商演化史

需要交易，渴望財富，不僅是商人存在的前提，也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從陸地到海洋，人類竭盡全力擴大交易範圍的過程，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了探索未知世界的發現之旅。

從闖蕩天下、一度主導了南海民間貿易的海商，到居於口岸、總攬西方來華貿易事宜的行商，粵商，一直在風雲多變的國內外大勢中摸索前進，直至發展成了主導中外貿易格局的中堅力量。

087 第四章 鐘擺搖動，廣東迎來「世界時間」

正當歐洲人努力張開時代的風帆，竭盡所能向海外發展的時候，中國的清朝統治者卻逼迫沿海居民離開世代居住的土地，回遷內地。這不僅讓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了一場浩劫，給國民經濟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也是一次文明的大倒退。

而就在清政府實施「遷海」令，試圖讓人民與海洋徹底隔絕的同時，全球化浪潮已經滾滾而來。不管你願意與否，一個終將覆蓋全球的「世界時間」，伴着時鐘機器發出的節奏，正向中國步步進逼。

與此同時，繼晉、徽商幫成就的輝煌之後，一個屬於廣州十三行商人、屬於粵商的新時代，就要到來了。

119 第五章 一口通商，中國唯有十三行

一口通商，是廣州十三行的機會，也帶來了責任和風險。因為，十三行行商不僅壟斷了中外貿易，也要負責經辦具體外交事務。他們跨越政商兩界，周旋於官府與洋人之間；他們既要尊重中國國情，又得明悉世界大勢；他們不僅是中國的商業精英，也是對外進行政治、文化和科學交往的先驅。

因緣際會，在人類社會總體轉型的關節點上，廣州十三行行商們成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直接參與者與推動者。

151 第六章 行商，樹起中國商人的世界形象

鼎盛時期的廣州十三行是全世界的聚寶盆。這個華洋雜處的奇妙之地，像磁石一樣吸引着世界，也接受着世界的影響。由此，廣州、廣州十三行就成為古老中國緩慢向近代轉型的一個歷史性起點，成為近代中國百年變革的發源地，它既是一個展示中國形象的窗口，也是重塑中國形象的發力點。

在那個世界對中國滿懷誤解與偏見的特定年代，在那個大清帝國對世界既輕蔑又疑懼的矛盾年代，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們站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匯點上，小心翼翼地樹立着這個國家的民間形象。同時，他們也在努力重塑中國商人的形象，一點一滴地推動着這個古老帝國向近代轉型。

189 第七章 國運，從商人的境遇看大國興衰

一邊是近代商業文明的傑出代表，一邊是失去了社會活力的老舊帝國，中英兩國商人的不同境遇，標記了兩種文明的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運的興衰。

鴉片戰爭，是一場因貿易糾紛而引發的戰爭。英國是一個得益於貿易擴張而急劇崛起的近代強國，它視商業利益為國家利益，無論是政治還是外交，都要或多或少地服務於貿易這個立國之本。所以，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較量，其實也是近代商業文明與傳統農耕—遊牧文明的較量。

狂飆過後，大清帝國和廣州十三行行商們都進入了飄搖零落的衰敗期。

225 第八章 化蛹為蝶，廣東行商的涅槃之路

鴉片戰爭作為一個分界線，標誌着中外貿易關係由番邦來朝的納貢制，進入了由法律和條約主導的條約制。與此同時清王朝只准一口通商變成了五口通商，由十三行專攬對外貿易的時代結束了。

在十三行行商出身的吳健彰主政上海期間，廣州十三行行商紛紛藉機轉型，與外國洋行一起大舉北進，進入上海，從而催生了又一個特殊的商人群體：廣東買辦。廣州十三行行商及其他粵商以「買辦」的形式在上海異軍突起。他們作為中西貿易文化交流的橋樑，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

255 第九章 廣東買辦，在上海開創粵商新時代

五口通商以後，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成為中西文明交流互動的又一個至節點。從上海開埠之初直到此後的許多年裡，無論是中國從這裡走向世界，還是世界從這裡進入中國，粵商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並因此催生了一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走向的特殊群體：廣東買辦。

在腐朽沒落的舊中國搖搖欲墜之際，一向被傳統觀念所歧視的廣東商人身體力行，奮走呼號，承擔起了民族振興的重任。徐潤、唐廷樞、鄭觀應構成了拉動洋務運動艱難前行的三駕馬車，助力李鴻章、曾國藩等洋務派領袖，開始探索一條自強之路。

287 第十章 洋務運動，粵商推動中國轉型

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不僅因為它締造了為期三十年左右的「同光中興」，初步建立了中國近代工商業的基本框架。與此同時，它也讓朝廷親貴、開明官僚與熟悉洋務的近代商人結成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精英同盟，並且摸索出了「官督商辦」的操作模式。

粵商，全面參與了這場社會經濟變革，為了推動中國向現代化轉型，以他們的專長、才幹和資金實際主導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洋務自強運動；為了讓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粵商又有意識地超越了「官督商辦」的洋務自強運動，向思想啟蒙、國民教育、文化更新等上層領域提升，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全面影響了近代中國。

粵商，由逐利的商人到推動國家進步的改革者，是一次質變，也是他們從中國各大商幫中脫穎而出，實現身份超越的標誌型特徵。

325 第十一章 摩登時代，粵籍僑商塑造時尚生活

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變革，其最終目標都是讓人過上更有尊嚴、更幸福的生活。粵商作為中國最先進的商人群體，自明清以來始終致力於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和進步，從海商到行商、買辦，代代相傳，層層遞進。

民國成立前後，旅居海外的粵籍僑商紛紛回到香港、廣州和上海發展，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家經營環球商品的大型百貨公司先後開張迎客。由南至北，粵籍僑商發動了一場新興商業文明的「北伐」。他們把現代化變成了一種觸目可見、觸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他們讓中國迎來了一個時尚新潮的「摩登時代」。

365 第十二章 商脈，在疾風驟雨中流傳

從明朝的海商，到清朝的行商、買辦，再到民國時期的歸國僑商，數百年來，廣東粵商因時而易，順勢而為，不斷演進，構成了完整、獨特的發展脈絡。

粵商作為一個不事張揚的商人群體，承受着近代中國的轉型之重，粵商一點一滴、腳踏實地而又卓有成效地推動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無論世道如何艱難，最終他們總能頑強地克服重重困難，延續它那特殊基因，做到一脈相承、根基不斷。

近代中國的對外開放史則標記在粵商發展的每一座里程碑上。一代又一代粵商上下銜接，不斷延續而成的商脈，將中國與世界愈來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391 參考資料

海洋、商人與中國社會轉型

考察中國社會轉型，追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腳印，一個長期被人遺忘的事實便是：得風氣之先，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變遷，進而走在變革前列的，是明清以來一直在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這個群體被稱為：粵商。

粵商，才是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斷發生碰撞、衝突與融合的交匯點上，在歷史風雲變幻之際，承載起轉型之重任，腳踏實地推動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今天的中國人，終於認識到了海洋的力量。所以，「沿海」這個詞在當下語境裡意味着開放、先進與繁榮。

今天的中國人，終於看到了商人的價值。所以，「商人」這個詞在當下語境裡意味着富有、精明與成功。

對海洋與商人的肯定，顛覆了已經延續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反映了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也彰顯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偉大成就。

在漫長的歷史時空裡，如何面對海洋，怎樣對待商人？

這始終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由此，對海洋與商人的態度，便成為衡量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將海洋、商人與社會轉型聯繫到一起進行綜合考察，便成為探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特殊視角

這也是今天我研究粵商和書寫這本書的意義。

一、「海內」與海外：東方和西方商人的兩種境遇

無論哪個國家，由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都是一個曲折而複雜的過程。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自成文明體系的東方古國，這個過程尤為艱難。

中國古代歷史一向是以陸地為舞台，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以權

力鬥爭為主要脈絡的不斷重複上演的悲喜劇。對於那些習慣了農耕文明和傳統御民術的統治者來說，海洋和商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不易掌握的異類。因此，士農工商，商人被定位於四民之末，長期受到限制、貶抑。至於海洋，則乾脆被視為治外之域。中國皇帝自我吹噓的所謂君臨天下，其實也僅僅局限於「海內」這片特定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強調的只是這個「土」。

秦王嬴政滅六國而「併一海內」，威風八面地當上中國的「始皇帝」之後，連續做出了兩個影響未來的重大決策，一是眾所周知的「焚書坑儒」，禁錮思想，消除異端；另一個便是在東海岸邊的胸山豎起界石，作為大秦帝國的東大門。海洋，就這樣被關在了國門之外。

浩瀚的海洋，因無邊無際而顯得渺遠莫測。建下「萬世之功」的秦始皇，對海洋的所有想像與開發，也只是先後派出徐市、盧生、侯生出海尋找仙人和長生不老的仙藥而已。

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對海洋的態度，被此後歷代君王效仿。直到明清之際，隨着大航海時代的來臨，究竟該如何面對海洋？終於發展成讓朝廷上下反覆糾結的問題，時常猶豫在開海與禁海之間。這種糾結與矛盾，阻滯了中國走向世界的腳步，延緩了中國進入現代化，也構成了異常坎坷的中國近代史。

中國統治者崇拜土地，忽視海洋，而且一貫施行重農抑商的治國之策，防止商人憑藉財富與他們「分庭抗禮」，危及以君權為核心的社會等級秩序。

春秋時期的齊國名相管仲說：「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意思是，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的國家強大無敵。先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杜絕民間謀取高利，限制他們獲利的途徑。

因此，予之、奪之決定於國君，貧之、富之也決定於國君。這樣，人民就擁戴國君有如日月，親近國君有如父母了。

管仲的這段話，作為弱民賤商的經典表述，被歷代君王們奉為控制百姓、治國安邦的金科玉律。

繼秦始皇把海洋關在國門之外以後，「威加海內」的漢高祖劉邦又頒布了一系列賤商法令：「（漢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也就是說，對商人不僅重租稅，而且連衣着乘車都做了限制，不許商人着絲質的衣服、不得乘馬車，甚至規定商人的子孫不能做官。由此，本為四民之末的商人就被徹底打入了另冊。

拒絕海洋，弱民賤商，使中國停滯在自我封閉、經濟單一的農業社會。舉國上下共同陶醉在「物華天寶，不假外求」的自足裡，既失去了對外探索的動力，也錯失了主動提升的機會。

在海洋的遠端，在遙遠的西方，意大利人正積極利用海洋來開拓東方貿易，並在歐洲催生了一個新興的商人階層。這個生機勃勃的新階層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創新能力，率先邁出告別中世紀的腳步，最終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的社會形態。

文藝復興作為一個新時代誕生的標誌，從它在意大利萌芽，到蔓延歐洲各國，遍地開花結果，都得益於商人的幫助，也都留下了商業革命的印跡。作為文明進程的重要載體——報紙，最早也創辦於當時歐洲亞得里亞海畔的重要商港威尼斯，這份不定期發行的《威尼斯小報》（*Venice Gazette*），主要收集的也是有關商業、貿易的信息以及法庭、城市動態等新聞，是專為商人和王公貴族辦的。

在當時的上流社會非常流行，從而成為報紙發展過程中一項帶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後來改手抄為印刷，加大了發行力度，被後人稱



當時的意大利威尼斯港（油畫）

為《威尼斯公報》。

儘管西方學者對文藝復興的起始年代存在爭議，但若論及文藝復興發源於意大利的原因，卻都首先肯定了海洋與商人的作用。意大利作為東西方貿易的必經之路，威尼斯、那不勒斯、熱那亞和比薩實際控制了地中海貿易。佛羅倫斯、波倫亞、皮亞琴察和倫巴德平原地區其他城市的商人，是南歐和北歐之間商業往來的主要中間人。貿易帶來的繁榮、貨幣經濟的興起，為思想和藝術進步提供了重要基礎。

在西方話語體系裡，「『貿易』」這個詞具有雙重含義，它不僅指商人為追求利潤而進行的交易活動，同時也是城市的生命線。貿易的發展與城鎮化幾乎是同一概念。」^①

商業革命促進了城市的興起，為文藝復興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① [美] 內森·羅森堡、L.E. 小伯澤爾著，曾剛譯：《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變遷》，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4 頁。

「文藝復興社會帶有城市的，而不是農業佔主要優勢的性質。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中心已經不再是封建貴族的城堡和采邑（即西歐的采邑制，是指西歐中世紀早期國王封賞給臣屬終身享有的土地），而是佛羅倫薩、米蘭、威尼斯和羅馬這樣的富庶的城市。」^①

商業革命使商人成為一群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新貴，他們以雄厚的資本作後盾，為文藝復興推波助瀾。

偉大的尼古拉·哥白尼即出生於富裕的商人之家。他在意大利留學期間接受了人文主義思想，並因此改變了他的人生。從費拉拉大學獲取法學博士學位後，到波羅的海地區弗隆堡教堂擔任司庫。我們都知道哥白尼發表了舉世震驚的《天體運行論》，以「日心說」成為現代天文學之父，可我們也許不太知道哥白尼曾撰寫了關於貨幣理論的重要論文《論貨幣的一般理論》。在這篇論文裡，哥白尼率先提出了格雷欣法則中的論斷，即「劣幣驅逐良幣」。

意大利不僅是文藝復興的搖籃，也是銀行業和信貸業的發祥地。在西方，所有與銀行業務有關的詞語，諸如賬戶、破產、貼水、信貸、貼現等等都源自意大利語。當時銀行業的中心在佛羅倫斯，擁有最大銀行的美第奇家族既是佛羅倫斯的統治者，也是最著名的文化贊助人。

與「利出一孔」的中國統治策略不同，即使在中世紀，「並非所有東西都歸國王所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已經成為歐洲國家的政策基石。在此基礎上，發動於14世紀初的商業革命、文藝復興與後來發生的宗教改革交互作用，經過幾個世紀的社會轉型，共同塑造了近代歐洲。

關於商業革命的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西方的學者這樣評價：「如

① [美] 菲利普·李·拉爾夫、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羅經國等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20頁。

果中世紀經濟方式不發生急劇變化，思想和宗教也不可能發生巨大變動。」「不言而喻，商業革命是西方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如果沒有商業革命，就不會有現代經濟生活的方式，因為它使商業的基礎從中世紀本地的和地區的水平變成至今依然存在的世界性規模。……總之，商業革命後來發展成為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許多因素。」^①

利用海洋與拒絕海洋、重商與賤商，構成了東西方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沿着商業革命、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創的道路。西歐各國廣泛接受重商主義理論並應用於實踐，完成了地理大發現，將貿易拓展為全球性的事業；實現了工業革命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數百年來，經過一系列偉大變革，終於率先迎來了現代化的曙光。

西方的近代史因開放、變革、擴張而成為炫耀其發展成就的輝煌篇章，中國的近代史則是寫滿了自閉與自大、保守與停滯、失敗與屈辱的一紙血淚。

學術界習慣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肇端，但也有人認為，應將 1511 年中國的番屬國滿刺加（14—15 世紀馬來亞王國，約在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州。1511 年葡萄牙入侵後衰亡。現多譯為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定為近代史的上限。無論如何，中國進入近代史的標誌都是面對西方世界的失敗。

中國的社會轉型，從明清之際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因形勢所迫而採取的被動應對，到全民族普遍覺醒、以現代化為目標的主動追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這漫長而痛苦所構成的民族集體記憶，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使我們更加渴望民族復

① [美] 菲利普·李·拉爾夫、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羅經國等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 1987 年版，第 238 頁。

興，更加急於重振國威，以至於一度簡化了對「現代化」這個概念的理解。

關於「現代化」的描述，最為今人熟知的大概就是所謂「四化」，即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長期以來，實現「四化」被當成既定發展國策而深入人心，甚至影響了對這個詞彙的定義。幾十年前，我們曾以「四化」憧憬未來的現代化；進入網絡時代的今天，人們開始重新定義「現代化」這個概念。維基百科、百度百科、互動百科等網站都列出了這個詞條，而且做了相似的解釋。以百度百科為例：

現代化常被用來描述現代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的現象。根據馬格納雷拉的定義，現代化是發展中的社會為了獲得發達的工業社會所具有的一些特點，而經歷的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過程。

……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深刻變化，是文明要素的創新、選擇、傳播和退出交替進行的過程，是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國際競爭。

現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產力（效率）的解放」，因從歐美等西方社會開始，有時也被稱為「西方化」，但不專屬於西方社會。

現代化是「包容一切的全球性過程」，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深刻變化」，是『『人性的解放』和『生產力（效率）的解放』』……亨廷頓則把它濃縮成了一句話：「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的變革。」

由傳統向近現代社會轉型，本質上是由舊文明向新文明轉型。中國進入這個脫胎換骨的轉型期以來，從維新、改良發展到全面革命，主要發力點都集中在軍事、政治、文化和基礎工業領域。有關現代化的主流言說，也大都成了以政治強人、思想先驅為主角的宏大敘事。重農抑商、弱民賤商的傳統思維，使我們習慣性地忽視了貿易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

商人，這個從事經貿活動的主體，更成了不受眾人關注的盲區了。

不受關注，並不等於沒有價值。儘管商人早已被歷史性地剝奪了諸多權利，成為一個備受歧視的邊緣群體；儘管古代中國沒有機會發生通往現代社會的商業革命，也無法建立起真正的商業文明。但是，在西風東漸、海上貿易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事業之後，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和影響，則開始不容置疑地顯露出來了。

考察中國社會轉型，或者說追求現代化的歷史，一個長期被人遺忘的事實便是，得風氣之先，最早感受到時代變遷，進而走在變革前列的並不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大員，也不是自命不凡的傳統士大夫，而是明清以來一直在廣東沿海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

廣東簡稱粵，所以這個群體被稱為粵商。

粵商，他們才是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們始終以開放的姿態屹立在中西文明不斷發生碰撞、衝突與融合的交匯點上，在歷史風雲變幻之際，承載起轉型之重，腳踏實地推動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發現粵商，發現商人對社會轉型的積極意義，才能正本清源，全面地理解歷史，準確地把握未來，才能清晰地追尋出中國現代化的腳印。

二、粵商，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

我把粵商的發展史放到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這個大背景下來思考，最初是緣於對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研究與認識。2008年，我在創作長篇思辨體報告文學《中山路——追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腳印》一書的採訪考察過程中，重新認識了廣東的近代史。在查閱了大量史料、走訪了一些專家學者和考察了諸多歷史遺跡之後，我隱約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沒有近代商業文明，沒有粵商在對外開放中取得的前沿地位，中國不會出現孫中山這樣的革命家，不會出現梁啟超這樣的思想家，甚至可能不會發生結束數千年皇權專制歷史的辛亥革命。

正如西方的文藝復興需要商人提供全面支持一樣，中國的思想創新與社會進步，同樣依賴商品經濟發展和商人階層的推動。商品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公平交易，商人的行為守則是尊重契約。渴望公平、希望以條約的形式界定社會各階層的權域，使商人成為要求社會變革、結束專制統治的基礎力量。所謂現代文明，其實是商業文明、契約準則向社會其他領域的延伸。因此，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才叫作《臨時約法》。

當年孫中山之所以能經營起他的革命事業，進而成為影響全國的領導者，依靠的首先是廣東籍海外華僑商人的資本支持。而推翻清政權的辛亥革命，歸根結底也是一場商人革命。

民國時期的學者王孝通在其《中國商業史》裡這樣寫道：「辛亥革命，其端實啟自商人。奕劻當國，收商辦鐵路為國有，商人群起而反對，各界以公理所在，群起而為商人後盾，遂釀成莫大之風潮。民軍乘之，遂首先發難於武昌，各省聞風，先後響應，商人及寓外僑商，慷慨輸財，以供軍餉，民國之造，商人當在首功之列。」

從孫中山到辛亥革命，從辛亥革命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粵商不斷躍入我的視野，吸引我走進一個全新的思考與寫作領域。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發掘、探尋之旅。與今天的有些商人紛紛搶佔媒體頭條，站立網絡話語高地，出書論述指點江山，高調炫耀出人頭地不同。中國古代的商人既是邊緣群體，也是沉默的群體。他們作為一個備受歧視的尷尬階層，不僅無法取得主流話語權，而且飽受各方排擠和輿論打壓。特別是身處沿海地區，在中西政治、文化衝突的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的粵商，他們一向秉持高調做事，低調做人，謹慎小心，不事張揚的處世原則，使其歷史發展脈絡更是顯得撲朔迷離。雖然徐潤、鄭觀應都有著述遺世，但其經商從政以及與洋人和官府周旋的具體細節卻很少道與外人，他們越是諱莫如深，越讓人覺得玄機重重。

舊時法律缺少對商人的保護，粵商「倚徙於華洋之間」，深陷各種利益紛爭的漩渦當中，使他們成為一個高風險群體。「尤其是晚清掀起的洋務運動浪潮，完全把他們推到政治與經濟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使他們時刻都有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危險」。^①嚴峻的生存環境，讓他們戰戰兢兢，如臨如履。

我在香港採訪廣州十三行行商、太古洋行香港總行買辦莫仕揚的後人莫華釗先生時，他講述的一個不為人知的細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在他的童年記憶裡，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家裡總在燒賬本。這個一度壟斷中國沿海海運和長江、珠江內河航運，創立著名品牌「太古糖」，為太古洋行拓展了保險、船塢、製漆等多項業務，並獲清廷頒授奉政大夫、朝議大夫和資政大夫的豪商家族，

① 王遠明、胡波著：《被誤讀的群體：香山買辦與近代中國》（序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卻不敢留下從事經營活動的文字記錄。未來的不確定性，讓他們心生恐懼，不惜一次次燒掉了歷史的痕跡。

在歷史的餘燼中重新發現粵商，還原這個群體的真實面目，對於長期專注這個課題的學者們是個持續的挑戰，對我這個以報告文學創作為主的作家，則是走上了一段坎坷的迷途。我自 2008 年開始在寫作《中山路》之餘，盡可能廣泛地搜集粵商的各種文獻資料，研讀世界商業經濟發展史，考察廣東歷史舊地和訪問遺存老人，求教國內外從事經濟史和商業史研究的著名專家、學者、教授，然後從一些蛛絲馬跡中追尋粵商的發展軌跡和生命歷程。

正式開始寫作始於 2013 年的 1 月 4 日，那年元旦的鐘聲剛剛敲響，由天津南開大學、上海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市社科聯共同主辦的「買辦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在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樓演播廳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聚集一堂，重新審視買辦商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再次討論粵商對近代中國的多方位影響。會議也邀請了部分著名買辦商人的後人與會，並參加學術討論，提供歷史資料。

這是個難得的採訪機會。在海內外學術界的積極參與下，特別是在廣東省社科文化部門的有力支持下，一向冷僻的粵商研究終於露出了繁榮的端倪，一向隱忍的粵商後人終於開始道出他們的家族往事。我懷着對粵商這個研究課題的強烈興趣，懷着與粵商後人進行直接交流的願望，從我居住的深圳，飛往天津。

只是三個小時的航程，卻彷彿跨越了兩個季節、兩個世界。從溫暖如春的深圳出發，下了飛機卻是滴水成冰的天津。第二天我走出賓館大門，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凍；北方的早晨，霧氣沉沉。根據這次活動的組織者之一中山市社科聯主席胡波先生在電話裡告知的路線，我趕往南開大學。

為了及時到達會場，還在計程車上我就開始向司機打聽會議地點的位置。司機的回答卻不禁讓我有點擔心，計程車不准駛入南開校園，只能把我送到校門口。

南開大學的校園，寬廣得無法用腳步丈量，必須藉助由小客車、電瓶車組成的內部公交系統代步。我迎着零下近十度的凜冽寒風，穿過重重霧霾在校園裡往來穿梭，尋找東方藝術大樓，探尋有關粵商、買辦的歷史。

儘管遇到了一些曲折，這卻是一次收穫頗豐的採訪。出席本屆研討會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梁元生先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熊月之先生、宋鑽友先生，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系教授黎志剛先生等人都是粵商研究領域裡的重量級人物。通過採訪和交流，我了解了他們的研究成果，也證實了我對粵商形成的基本判斷，堅定了我通過史辯的方式來反映粵商發展史的決心。

幾年來，廣東歷史上的或者從廣東走出去的粵商名人吳添進、林道乾、伍秉鑒、潘仕成、吳健章、莫仕揚、徐潤、唐廷樞、鄭觀應、馬應彪、郭樂等一系列名字成為我追蹤的目標。自明清之際廣東商幫形成以後，他們作為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繼繼繩繩，在近代中國努力融入全球性轉型浪潮的艱巨歷程裡，經險履危，負重致遠，終於讓世界認識了中國，讓中國走向了世界。

眾所周知，中國許多沿海地區都曾有过或長或短的對外貿易史，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廣東這樣始終保持着對外開放的優勢地位。從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到唐、宋、元、明四朝市舶使司的設立與延續，再到清代的「一口通商」，這裡一直是溝通中外的前沿。

身處中央帝國在南方邊陲長期保留的貿易通道，廣東人養成了特有的重商傳統，工商業也較內地發達。到了明朝嘉靖年間，葡萄牙人

揚帆東來，廣東商人首先感受到了世界形勢的劇烈變化。他們發現，與以往接觸過的東南亞、日本朝貢商人不同，這些來自西方的「番鬼」們，不僅送來了新奇的自鳴鐘，還有讓人膽寒的「佛朗機銃」(洋槍)；不僅宣揚「地圓說」，還展示了令人大開眼界的世界地圖……這些陌生的遠方來客，「兵械較諸番獨精」。因此，他們被以精銳的武器命名，「佛朗機」，既可指稱「佛朗機人」，也可代表「佛朗機銃」。為區別過去那些前來朝貢的「蠻夷」，有人乾脆叫他們「強番」。幾千年來形成的天朝上國、萬邦來明、唯我獨尊的文明優越感開始受到衝擊，歷史悠久的朝貢貿易體系也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縫。

葡萄牙人租住澳門，無論對中國還是西方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他們率先在這個東方帝國的邊緣打開了一個缺口，讓西人東來有了第一個立腳點，也為西方諸國樹立了一個可以參照、仿效的樣板。從此，荷蘭、西班牙、英國的商船隊紛至沓來，廣東商人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對清朝官府來說，這些接踵而至的西洋人卻成了棘手的麻煩。儘管官府強勢拒絕西方的自由貿易規則，卻又無法將他們納入舊有的朝貢貿易體系，於是，專門負責對外貿易的廣州十三行便應運而生了。

因緣際會，十三行行商們就這樣被歷史推到了中西互動的前台。他們不僅代表中國參與方興未艾的全球貿易，中西之間在政治、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涉與交流也主要由行商們具體操辦。他們實際充當起了大清帝國的外交人員，幾乎包攬了一切洋務或「夷務」。他們是最了解西方的中國人，周旋於官府與洋人之間，或富甲天下，盛極一時；或家破人亡，發配邊關。他們在重重風險與阻礙中攫取財富，同時也推動了中國工商業的變革和社會發展。

鴉片戰爭結束了廣州一口通商，公行制度也隨之解體。走向衰

落的十三行商們憑藉對西方的了解與長期積累的外貿經驗，開始向洋行買辦轉型。這次轉型，直接導致了粵商的大規模北進，也促進了上海這個現代大都市的開發建設。

粵商北進的過程，也是把自己的影響力向全國輻射的過程。在晚清的政治經濟變局中，他們率先突破了傳統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一邊積極傳播改良思想，開啟民智；一邊投身洋務運動，推動國家工業化進程。在與時俱進的自我更新中，他們由洋行買辦轉化成維新思想家、現代企業家，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骨幹力量。

任何商幫都是時代的產物，它們因時代而興，因時代而衰。與那些已經被歷史淘汰了的商幫不同，幾百年來，粵商總能適時把握歷史發展趨勢，引領中國工商業不斷追趕世界的腳步。從廣州到上海，他們成就了中國兩大經濟中心城市的崛起，成為中國城鎮化的早期推動者、實踐者。

由粵商充當操盤手的洋務運動，讓中國有了自己的鐵路、礦廠和輪船公司，由粵商經營的環球百貨公司則徹底改變了傳統商品銷售模式與消費觀念，使上海和世界所有大都會一樣摩登、時髦。

人們追求現代化的目的是為了過上現代化的生活。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使現代化成為看得見、摸得着的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着人們的思想與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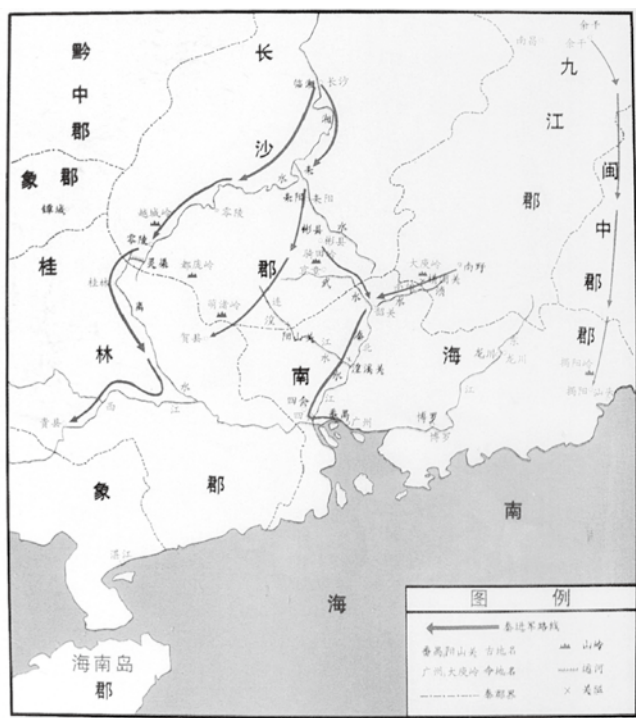
開放、創新、進取是粵商的傳統，也是粵商的特質。浩瀚的海洋使粵商獲得了有別於徽商、晉商的成長經歷與精神氣質。他們始終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得益於海上貿易，也致力於對外開放。他們的成敗興衰，既反映了中國沿海商人面臨世界大局變幻時的調適和應對，也折射了中國維新變革的艱難與成就。

可以說，粵商的發展史，濃縮了傳統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艱辛歷程。

嶺南，一片屬於探索者的土地

千百年來，嶺南作為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的融合之地，得山海之利，發展出了特有的以五嶺—珠江—海洋為表徵的山海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無論是穿越「梅關古道」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還是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國商人，他們都是不畏艱辛的探索者，他們及其後代子孫的身上都蘊藏着開拓者的基因。

這也是嶺南人樂於面對藍色海洋，勇於改變陳舊世界的文化血脈。



秦嶺—嶺南進軍路線圖 *

在中國內陸的南方，由東至西橫亙着一條綿延 1100 多千米長的山脈，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蜿蜒相連。這五嶺之南，便是向海洋伸展的嶺南大地。

崇山峻嶺，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礙了中原與嶺南的交通。在悠久的中華文明史上，這裡曾被稱為「蠻夷之地」「瘴癘之地」「發配充軍之地」……如此一系列以中原為中心的描述，無不突出了走向嶺南之路的險峻與艱難，也彰顯了它不同於內地的異域特徵。

有學者斷言，任何文化最終都是自然地理的產物。在李約瑟和黃仁宇這兩位史學大家共同撰寫的《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裡亦有這樣的論述：「中華民族精神的構成，當然是一個可以進行不同詮釋的主題。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多麼強大，也不能掩蓋其下還存在着氣候、地理和社會融合等物質性力量這樣的基本事實。中國的歷史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文明的歷史，乃在於中國在公元前若干個世紀裡就發展出了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所達到的高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源於政治思想家們的想像，而是由環境造成的。地理是壓倒一切的因素。」^①

受地理因素影響，嶺南大地，自古便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存在。它既與中原內陸遙遙相連，被早早納入了大中華的文明板塊，又因山重水隔，瀕臨南海而呈現出有別於中原內陸的精神氣質。

這是一片屬於勇者的土地。華夏民族首次開發嶺南，就是一次探險式的征程。從屠睢、史祿，到任囂、趙佗，秦朝將領從中原出發，一路跋山涉水，前仆後繼，終於在公元前 214 年統一了嶺南。首任南海郡尉，被後人稱為「嶺南第一官」的任囂，在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築的番禺城，俗稱「任囂城」，也就是今天的廣州城。

發源於黃河沿岸的中華文明，經過千里迢迢的遠征，完成了一次令人驚奇的地理大發現。

① 黃仁宇：《現代中國的歷程》，中華書局 2011 年版，第 2 頁。

這是一片得天獨厚的土地。東江、北江、西江自高山密林間奔湧而出，在廣州附近匯流入海，構成了河道遍布的珠江水系。經過江水數千年的沖刷沉澱，在其入海口處堆積成了一片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任囂為嶺南的歷史發展找到了一個基點，脫胎於中原農耕文明的嶺南山海文明由此濫觴。

任囂對自己的繼任者趙佗說：「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他以戰略家的眼光看到了番禺城（廣州城）的山海之險，歷史的發展又不斷地凸顯了它的山海之利。

據山海之險，使嶺南地區較少受到中原戰亂頻仍的侵擾，成為北方漢人南下避難的世外桃源。繼秦朝大規模軍事移民之後，魏晉南北朝、兩宋末年和清代初年，都曾經出現過大批中原人遷居嶺南的移民潮，並形成了嶺南漢人三大民系之一的廣府民系。其中北宋末年經南雄縣珠璣巷進入嶺南的先民，更被今人尊為共同的祖先。

佔山海之利，讓嶺南地區的商業得以迅速發展、繁榮。這裡擁有長達 4900 多千米的大陸海岸線，除海南島外，還點綴着 3800 座大小島嶼。早在西漢，司馬遷就曾說：「番禺亦一都會也。」兩漢時期，從嶺南沿海出發，通往大秦（古羅馬帝國）、安息、天竺等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即已開通。

千百年來，嶺南發展成了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的融合之地，又踞山海之險，得山海之利，形成了特有的以五嶺一珠江一海洋為表徵的山海文明。無論是穿越「梅關古道」進入嶺南的中原人，還是漂洋過海而來的外國商人，在這片土地上，他們都是不畏艱辛的探索者，他們及其子孫的身上都蘊藏着勇於開拓，勇於創新的基因。他們共同形成了嶺南特有的文化和商業文明，並一代一代延綿至今。

秦滅六國，是舊制度的終結，也是新制度的開始。從此，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徹底取代了「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天下一統，成為中國歷史的新主題。也正是由於對統一的熱切追求，嶺南開始併入中華文明的新版圖，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

公元前 219 年，已經統一了中原的秦始皇正陶醉在開創歷史的喜悅裡。他先是東行泰山，封禪望祭山川，刻石立碑稱頌「初并天下，罔不賓服」的殊功；然後又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宣揚「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的偉績。前所未有的成功，讓他愈加雄心勃勃。大約也是在這一年，為了真正實現「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的目標，命屠睢率 50 萬大軍南征百越。

在中國的史書裡，所謂百越、南越、南粵、陸梁地、九嶷之南，指的都是嶺南這片古老的土地。稱謂的多樣性，反映了遙遠的中原人對它的多重認識。除了南越、九嶷之南等屬於地理方位的描述外，「百越」反映了秦朝之前，嶺南各部族還沒有發展出國家這種高級社會形態，尚處於部落群居或部落聯盟的原始階段；至於「陸梁地」則道出了當地的民風，唐朝學者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解釋說：「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對於自幼生長在中原內地、一向疏於山地和叢林作戰的秦軍將士而言，遠征嶺南注定是一次充滿危機與挑戰的冒險。他們將要遇到的對手不僅是分佈在嶺南各地的百越部落，還有山高林密，河多谷深的惡劣環境，以及由於交通極為不便而使輜重糧草難以運輸的供給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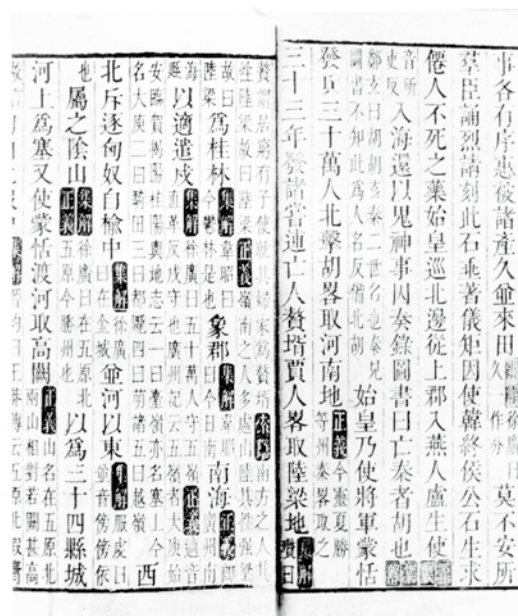
「出師未捷身先死」，當秦軍主帥屠睢指揮龐大的帝國軍團向南

方推進的時候，他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正在踏上一條不歸路。

據《淮南子》記載：「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帝國大軍剛剛接近嶺南地區，就受到了這些披頭散髮，渾身上下紋有蛇、蟲等部落圖騰圖案的土著居民阻擊。他們施展開翻山越嶺、駕船蕩舟的長技，充分利用山林河谷與秦軍周旋，讓秦軍屢受重挫。連主帥屠睢都在一次夜襲中被殺，軍士「伏屍流血數十萬」。

南征意外受阻，驍勇善戰的帝國軍團竟然陷入了「曠日持久，糧食絕乏」，「三年不解甲弛弩」的困境。

儘管戰事進入了雙方對峙的僵局，卻絲毫沒有動搖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意志。他一邊命令南征大軍的副帥趙佗「將卒以戍越」，就地屯兵，修築城堡，扼守要道；一邊派監御史祿「以卒鑿渠而通糧



《史記》關於中原軍南下嶺南及設置南海等三郡的記載。中原人的南遷對嶺南的早期開發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番禺從此成為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道」。史祿本是越人後裔，寓居咸陽並被秦人所用。在他的謀劃下，終於開鑿出一條專為南征大軍運送糧草的渠道，這條史上著名的人工運河，就是現存於廣西興安縣境內的「靈渠」。靈渠長約 30 公里，溝通了湘江和灕江，從而實現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連接。它不僅為秦軍征服嶺南提供了便利，在唐代以前，一直都是嶺南與中原地區人員物資往來的重要通道。

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 214 年，隨着靈渠的開通，秦軍向嶺南發起了決定性的一擊。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秦軍重新委派名將任囂為主帥，趙佗為副帥，率領由逃亡者、窮人子弟、商人組成的遠征軍再次揮師南下。在長達數年的征伐之後，任囂率領的帝國軍團終於一舉平定百越，兵鋒所指，所向披靡，直抵南海之濱。任囂成為首任南海郡尉，趙佗為龍川縣令。

南征百越的悲壯之師，成為廣府民系可以追溯的先祖。流傳久遠的中華文明，找到了一片開拓創新之地。嶺南，也從此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

嶺南進入由華夏民族主導的歷史發展階段之後，政治、經濟、文化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中央王朝在此設縣立郡，結束了百越民族「各有君長」「互不統一」的原始狀態。社會結構的變化，必然引發思想觀念的變革。狹隘的部族意識，短淺的山林視野，不可避免地被國家、天下這些宏觀概念所取代，人們的認知水平也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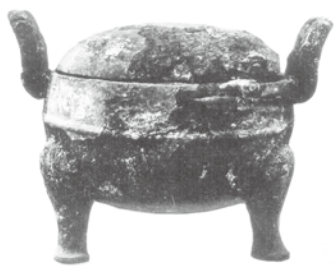
公元前 213 年，也就是秦軍平定南越的次年，秦王朝為有效控制這片新開發的土地，下令在五嶺開山道，築三關，即橫浦關、陽山關、湟溪關。橫浦關建在梅嶺頂上，因此後人也稱其為梅關或秦關。秦時幾條新道路的開通，不僅強化了帝國對嶺南的統治，而且



南粵雄關，梅嶺古道。

為文明傳播和經貿發展提供了基礎。其中，梅關古道從江西南安縣越過大庾嶺，抵達廣東南雄縣，歷朝歷代都是溝通南北的咽喉要道。

秦軍平定、戍衛嶺南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播文明的過程。如果按照「三代法」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來劃分文明的發展階段，嶺南地區可以說在轉瞬之間便由青銅時代一步跨入了鐵器時代。「在秦征服嶺南之初，南越人的社會生產水平明顯低於中原地區。比如中原在戰國時期已經普遍使用鐵製武器、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而南越人尚處於青銅時代。另外，南越人雖然也從事水稻種植等農業生產，但種植技術不發達，漁獵等生產活動仍在經濟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隨着秦軍南征，鐵器和北方發達的農耕技術才在嶺南得到廣泛傳播。特別是南越國時期，通過貿易等各種方式，各類鐵製用品在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普遍使用，南越國還出現了冶鐵、造船、紡織、漆器製造、玉器加工等各種手工行業，製造了許多精美的手工製品。」



「番禺」銅鼎，南越王趙 墓出土。*

角形玉杯。西漢前期，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用整塊青玉雕成。器物造型與紋飾渾然一體，是漢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品。*



鐵器的普遍使用、農業技術的傳播和造船業的興起，對嶺南地方經濟發展意義非凡，影響深遠。尤其是鐵器，它作為一種文明進步的代際標誌，改變了古代人類的生存面貌，也加快了嶺南的社會發展進程。

學者杜君立近年來一直專注於對「歷史的細節」研究，關於鐵的重要作用，他這樣寫道：「鐵器的出現迅速改變了社會從生產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恩格斯將鐵器時代稱為『英雄時代』。木犁裝上鐵鏵後，耕地效率大幅提高。鐵製農具使大量林地被開墾為耕地，糧食出產大增。鐵製工具使木匠如虎添翼，改變了建築和艦船的面貌。『鐵已在為人類服務，它是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後和最重要的一種學科。……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堅固銳利的、非石頭的、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恩格斯）鐵製輪箍讓車輪更加結實，從而使戰車成為戰爭的利器。鐵製武器被稱為『歷史上最好也最惡劣』的武器。」

秦軍憑藉鐵製的兵器統一了嶺南，又利用鐵製的工具開發了嶺南。

雖然南越自古便流傳着「五羊銜穀」的神話，表明當地人初步掌握了水稻種植方法，因此「五羊銜穀」的雕塑也成了廣州的城徽。但是，他們長期處於「刀耕火種」「火耕水耨」的原始生產階段，產量有限，不能保證人們生活所需。許多地方，漁獵甚至重於農耕，蟲蛇、蛤貝皆為日常食物。中原傳入的鐵製農具和牛耕技術，實現了生產方式的革新。在那個民以食為天的歷史階段，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前提。它不僅解決了南越人的溫飽問題，也為內地移民的大量湧入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保障。

與「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方式相仿，南越人的造船技術也處於「剡木為舟」的原始階段。儘管嶺南地區有着漫長的海岸線以及縱橫交錯的江河湖泊，所謂「陸事寡而水事眾」，但南越人只會編製竹排木筏或將樹幹掏空做成首尾不分的獨木舟。在中原人移居嶺南



廣州五羊銜穀城徽